

# 论旗籍作家武侠小说中的“关帝情结”

张书杰

**内容提要：** 旗人社会特出的“关帝情结”对清代和民国时期旗籍作家的武侠小说创作都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在“关帝情结”的作用下，旗籍作家非常注重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侠客情义，这一方面使得其武侠小说创作的内容丰富多姿，表现出浓厚的人间情味；另一方面，作家笔下的侠客情义又是被规范和被规训了的情义，有着对于侠客人生的围限和压抑。

**关键词：** 关帝情结 侠客情义 超越性 规范 压抑

在清中叶到民国时期的中国通俗文学史上，旗籍作家的武侠小说创作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里有开现代武侠小说创作之门的《三侠五义》，有文康的《儿女英雄传》，也有民国初期获得“南向北赵”之大名的赵焕亭和三四十年代武侠小说“北派五大家”之一的王度庐创作的诸多武侠小说作品。这些旗籍作家武侠小说创作的内容虽然多种多样，但是小说中表现出来的价值诉求却在很多方面具有相同或相似之处，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非常注重侠客情义的浓墨重彩的呈现，这一点与这些作家的旗籍身分有着密切的关系。应该说旗人社会特出的“关帝情结”是出现这一创作现象的重要推动力量。“关帝情结”既激发了作家们在自己的武侠小说创作中展现侠客情义，在作品中对侠客情义进行异彩纷呈的展示，并且由于对于侠客情义的注重，使得作品的情节内容充满了浓厚的人间情味，加增了人性内涵，表现出某种超越性的审美向度，同时，在潜隐意识中又对侠客情义进行了明显的政治道德规范和规训，进而带来了对于侠客人生的某种压抑。

## 旗人社会特出的“关帝情结”

对于关羽，中国古代社会有一个从英雄人物而神而王而帝而圣的逐步深入的崇拜过程。陈寿的《三国志》中出现的关羽还不过是一个英雄人物，其忠勇与刚愎自用都摄入史家的笔端，但是越到后来其越变得完美并神格化。宋、元、明时期的帝王都曾对其加封，特别是在国

内的政局出现动荡时更是如此,使其成为在汉地具有广泛影响的人物和人格神。深受宋明理学影响的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将关羽塑造成一个符合理学纲常伦理人格型范的人物形象,关羽成了一个集忠、义、仁、勇于一身的完人、圣人。<sup>①</sup>伴随着《三国演义》的传播,这一形象几乎家喻户晓,对于神化关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到了清代,社会上的关羽崇拜从上到下更是发展到极盛,而这种现象的出现,与清代帝王从肇基之始即开始的对于关羽的重视以及后来不遗余力的大力弘扬关帝崇拜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使得关帝崇拜不仅有力地参与了满洲王朝对于其统治地位合法性的建构,更使得关帝信仰在旗人社会中深深地扎下根来,形成了旗人社会特出的“关帝情结”。

首先,关羽是忠义的化身,崇奉关羽,在满洲兴起之初有利于强化八旗制度下的在旗人众对于主上的服从,从而使得旗人社会表现出对于满洲君王的高度认可,这就形成了旗人社会在帝王极力倡导、推动下的对于君主、对于国家的忠诚意识。毋庸讳言,相较于汉族,入关之前,满洲还是个文明晚进的部族,其崛起之初吸收了汉文化的很多营养。努尔哈赤自幼喜欢读《三国演义》,在其取得领导地位后即倡导对关羽的崇拜。皇太极对《三国演义》也是喜爱有加,“曾命儒臣翻译《三国志》及辽、金、元史,性理诸书,以教国人”,目的在于“使满族子弟,习于学问,讲明义理,忠君亲上”。<sup>②</sup>这里的《三国志》实际上就是《三国演义》,而其中的关羽也是其极力推崇的人物。清军入关,清王朝定鼎中原后,为了稳固满洲在汉地的统治,强调满汉共治,一方面大力倡导以宋明理学治国,尊崇孔子和朱子,以获得汉族士大夫阶层的服膺,另一方面就是进一步弘扬对关羽的崇拜,努力使这一与理学有着密切渊源的人物形象更具有普泛化的号召力,从而将以忠义神勇著称,并在汉族中拥有大批崇拜者的关羽推到了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并通过对关羽祭拜、加封以及在京城和全国各地大量兴建关帝庙来强化关帝崇拜,以在民间层面强化臣民对于国家的忠诚意识。

其次,是保护神意识。清代满族统治者对于这位汉地人物,不仅推动臣民信奉,自身也是充满将之神格化后的敬仰,被作为保护神来加以崇拜,甚至渗入到满族的萨满祭祀和宫廷祭祀典仪之中。在清宫的堂子祭祀中,作为三位朝祭神之一的关帝每日都在承受清代皇帝的供奉、祭祀。从祭祀标准来看,“在清代被封为‘帝’的关羽,享受到了帝王级的待遇,他已成为一个地位特殊的神”<sup>③</sup>。并且在清代,关羽显灵救助清朝统治者之事,比明代更多。以清朝从事的军事行动而论,从入关追剿农民军,平定三藩,到镇压后来不断涌起的各种民众起义,都出现

① 林振礼:《关帝信仰的理学文化蕴含》,《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2期。

② 昭桂:《啸亭杂录》(卷一,太宗读金史),及天聪五年(1631)闰十一月谕旨。皆转引自李宏坤《北京历代帝王庙内关帝庙初探》,《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③ 李宏坤:《北京历代帝王庙内关帝庙初探》。

关羽显灵阵前佑助清军之事。<sup>①</sup>因此,关羽也被看成是兵营或营房的保护神,而无论是在北京的旗营还是在驻防地区的旗营,倘有旗营就会有关帝庙,而旗营中倘有八个旗就会有八个关帝庙,不厌其多。直至今日,还有不少关于关羽作为旗营的保护神的传说在满族民众中流传下来。<sup>②</sup>而且,在清代很多旗人家庭也将关羽作为神灵与其它神灵一起加以供奉,称其为“护国明王佛”。<sup>③</sup>

第三是“尚武”意识。在《三国演义》中关羽不仅是忠义的化身,还十分神勇,这样一个人物对于以弓马得天下的清代帝王和八旗兵丁来说,尤其富于形象魅力。在汉地,关帝也是佛、道二家共同推崇的神祇,“明代,关帝渐为蒙古、女真诸部共同尊崇。这位英勇善战、忠君信友的三国时代蜀国大将演变来的人格神,对于崇尚武功的草原行国,或者‘水滨’狩猎的女真部落,确乎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吸引力。尤其当满族奋发崛起于辽东大地的年代,精神上正亟需这样一位实实在在的人格神,以取代往昔那些脱胎于虎、豹一类动物崇拜的原始战神”<sup>④</sup>,因此关羽得到崇信,也是与其“武勇”分不开的。实际上《三国演义》这本小说在辽东时期被满洲的文人学士翻译成满语后,不仅作为娱乐文学的一部分,还成为八旗将士领兵作战的军事教科书。“本朝未入关之先,以翻译《三国演义》为兵略,故其崇拜关羽。”<sup>⑤</sup>此外,旗人社会还有取材于《三国演义》用满文编写的歌,其中有满文的《关老爷过五关歌》《单刀赴会歌》等。关羽被清朝皇帝封为“武圣”,关庙被称为“武庙”,同时也正是这种意识的反映。

第四是兄弟友爱意识。在辽东时期,关羽得到崇奉,从上层而言,八旗军队各由旗主统领,需要加强团结,而《三国演义》中刘关张桃园结义,兄弟同心,无疑也表达着最高统治者对于八旗旗主不生异心、团结协作政治意愿的诉求。对于强调整体作战、纪律严酷的八旗军人来说,关羽的忠义无疑更能为他们提供精神动力。而这种忠义,不仅表现为对于主上之忠诚,对于八旗征战将士而言,也表现为对于彼此兄弟情义的忠诚,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战阵厮杀的勇猛无畏和同仇敌愾。因此,在清代,关帝也往往作为一个人格神而得到崇拜,八旗军队打到哪里,关帝庙就修到哪里,尤其是在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聚集地区,都修建有关帝庙。在这些地区,关帝的形象甚至比孔子还具有魅力,成为兄弟民族之间团结互助,共同维护祖国统一和国家安全的象征。有些庙除供奉关羽外,还有刘备和张飞的像,俗称“三义庙”,也在说

① 文廷海:《论明清时期世俗社会的关帝崇信》,《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 年第 11 期。

② 如流传于正红旗的《旗人为什么供奉关羽》、流传于正白旗的《阿三泪斩关公头》等,见赵书、常利民、崔墨卿主编《八旗子弟传闻录》,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9 年。

③ 《满族社会历史调查》,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年,第 27 页。

④ 刘小萌:《满族的社会与生活》,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年,第 372 页。

⑤ 王嵩儒:《掌故拾零》卷一,转引自刘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年,第 80 页。

明这种兄弟友爱意识在庙祀中得到的重视。而在和平时期,由于旗人属于国家的特殊权力阶层,这种族群意识和兄弟意识也是彼此强化的。

旗人社会的这种“关帝情结”,在清代以旗人社会为主要消费对象或目标读者的戏曲、评书、小说等作品中也多有反映,并且也是旗籍作家武侠小说创作中的一些重要生活场景。《施公案》<sup>①</sup>开篇即强调施公的旗人身分,施公的原型施世纶的父亲就是为清朝统一台湾立下汗马功劳的施琅,是汉人入旗,并列于上三旗中的镶黄旗。小说中至少有两次提到三义庙,而施公总是对于“刘关张”礼敬有加,叩头以拜。而在旗籍作家创作的武侠小说中,与关帝有关的意象更是多有出现。在《儿女英雄传》中,正黄旗汉军旗人安学海“见了关圣帝君定要行礼”,于是在路过彰仪门外的三义庙时,知道是“汉昭烈帝和关圣、张桓侯的香火”,要下车拜之(第三十二回)。旗人视关羽为护国神,绝不对他指名道姓,只能称“关帝”,俗称“关玛法”,“玛法”在满语中有“老爷”“老翁”的意思,所以也称“关老爷”。赵焕亭的《奇侠精忠传》中,除了于益和逢春在四川一处关帝庙假借周仓的大刀杀死马铁腿外,还有一处,即义仆梁国安为了给陈敬报仇,结果被红英施邪法陷害下狱,作者写了一个外号叫刘姥姥的狱卒,也与关帝有关。对于其以关老爷为由头进行谐谑,人们就会说“你这张嘴脸,只好给黑将军(周仓)作老婆,如何唐突关帝呢?”(第一五七回)这也在说明关帝庙的无所不在和人们对关帝的态度,那是深深植根到日常生活之中的。在王度庐的《宝剑金钗》中,俞老镖头歿后,李慕白帮助俞秀莲先将其厝置在附近的一处关帝庙里。《铁骑银瓶》中,玉娇龙的大哥宝恩作为钦差大臣从新疆回京的途中,就是宿在玉门关附近的关帝庙。《卧虎藏龙》中鲁翰林之家是一个旗人家庭,作者特意说明,其为迎娶玉娇龙而准备的洞房外边的堂屋,“摆着神龛,供着‘伏魔大帝’、‘观音老母’”(第十一回)。鲁翰林的母亲鲁太太,作者说到她颇为能干,作为一个女性而喜读《三国演义》。而且“平日智谋多端,刚愎自用,什么飞贼大盗,她都没放在眼里”(第十三回)。所有这些都可见关帝和“三国”故事在社会上尤其是旗人社会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对于旗籍作家的武侠小说创作来说,除此之外,还有更加非凡的意义。

### “关帝情结”下侠客情义超越性的审美向度

通俗文学的创作不同于知识精英文学的一个重要侧面,即在于不追求思想的先锋性和叙事形式上的陌生化,在思想观念上也更注意贴近读者的期待视野,讲究娱乐性,讲求情节的曲折动人。<sup>②</sup>在清代中叶开始逐步定型的武侠小说作为通俗文学的一种类型,除了以武行

① 佚名:《施公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13、213页。下文不再另注,只随文标明回数。

② 范伯群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0页。

侠的这一特征外,不同的作家如何不断出新,写出精彩动人的故事无疑成为作品能否成功的一个重要关键。由于清代最高统治者的大力推动,关帝崇拜在民间迅速蔓延开来,关帝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在其忠义的层面固然有护国、护主的大义存焉,而在民间,关羽的仁义层面还有着保民、义气互助的价值诉求,再加上其勇武的形象,这就很容易使其转化成为以武行侠的侠客义士侠义人格的一个楷模。揆诸清代到民国时期的武侠小说创作,可以发现,相较于非旗籍作家,旗籍作家的武侠小说创作在表现侠客行侠仗义的故事时,非常注重侠客之间因为道义相通而具有的情义,而这一价值诉求就使得旗籍作家的诸多武侠小说作品具有了某种超越性的审美向度。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是这些作家通过侠客情义演绎出一幕幕精彩的故事,并通过这些精彩的故事写出了侠义人物多姿多彩的性格,极富人间情味。而这种人间性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写出人性的深度和生活的美感,使得侠行人物在一定程度上会超越明显具有时代性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规约,而表现出人际交往中的人性之常,焕发着特殊的人情魅力。其二,表现侠客情义也是小说娱乐性的一个重要来源。小说在侠行人物人际交往的戏剧性的情节构置中,获得趣味性,从而使得通俗文学保有其特殊的不同于精英文学的独特魅力。三是由于对于侠行人物之情义的重点呈现,使得小说的结构艺术发生了演化,不再是某些长篇小说,尤其是通俗长篇小说单调单一的“串珠式”结构,也努力超越“珠花式”结构,而具有了较为明显的前后穿插、勾连的整体性结构意识,形成通盘性考虑的框架式结构。正是三者的紧密结合和相得益彰,使得旗籍作家的诸多长篇武侠小说作品,无论在人物的塑造上,还是在思想情感的表达上,都更见艺术上的精致。

《儿女英雄传》中十三妹救助遇险的安公子并在能仁寺毙凶僧固然是小说的精彩段落,也是这部小说被视为侠义小说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小说还有着侠客之间情义的重点呈现,即十三妹与邓九公寄名的师徒之交和后来安学海与邓九公的深情厚谊。而正是这种呈现,不仅有力地平衡着小说的闺阁传奇内容,也成为这部作品结构上的贯穿性因素,使得作品具有侠义内容整体上的完足性。在“不分满汉,但问旗民”的清代社会,这种情义更是超越了政治身分的分野。虽然《儿女英雄传》多被论者认为其思想陈腐,但陈寅恪在自己的诗文中多次提到《儿女英雄传》,他“对《儿女英雄传》的推重,则不仅包括了这部小说叙述方式上的创新,更有其描写的讲人情、重气节的时代气息。这唤醒了陈寅恪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温情回忆。”<sup>①</sup>《三侠五义》中侠客之间情义的表现更加突出。小说不仅在总体的思想主旨上表现出侠客的忠义,而且更是浓墨重彩来写侠客之间的私义,写出他们之间的情义,而因为诸多侠客尤其是“五义”之间性情的不同,作者还使得侠客之间的龙争虎斗成为小说的重要呈现内容。

① 谢泳:《陈寅恪与〈儿女英雄传〉》,《文艺研究》2013 年第 11 期。

通过侠客之间的意气之争,通过波澜迭起的故事,在行侠中不忘兄弟情义,通过兄弟情义之间出现的矛盾以及最后的和解,在“忠烈”的主题下,在与政治理性相缠绕的行侠仗义这一条主线之外,构建了另一条兄弟情义的情感副线,从而避免了道德说教的刻板,而使得小说同样富于人间情味,并不乏谐谑色彩,充满了戏剧性和趣味性。在小说所依托的宋代早期,关帝崇拜还没有十分盛行,显然创作此书的这些旗籍作家明显受到了清代关帝崇拜的时代氛围的影响,使得小说的叙事将侠客们对于以皇帝为代表的官府的忠义与侠客们自身之间的兄弟情义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即便是在皇权的维护已经不是正面价值的现代社会,这些兄弟之间的情义故事仍具有吸引人的力量,那是展现了人性、人情之美的。

到了民国时期的赵焕亭和王度庐的笔下,侠客之间的兄弟情义同样得到足够的重视,只是二人基于自己的时代视野又有了新的发挥。在赵焕亭最具代表性的武侠小说作品《奇侠精忠传》中,作者借助平叛来表现侠客的忠义,同时平乱也是小说显在的大的结构框架,而内在的框架则是一班武功少年的分途发展,作家还是要写侠客之间的兄弟情义。如果说,在《三侠五义》中,兄弟相处虽然也有矛盾,但都有足够的人品保证,因此冲突更多的是性情使然,非本质上的,那么当兄弟之间出现了本质上的冲突时,该如何解决这一冲突,而又不伤害兄弟情义,至少不给读者以“无情无义”的印象而容易接受呢?赵焕亭的处理方式是“仁至义尽”。小说的历史依托是平乱,而真正富于情感的笔墨则是写兄弟情义的可贵和其不得不然的崩解,这一点也成为作品引人入胜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在善于言情的王度庐的成名作《宝剑金钗》中,兄弟情义则更有了一番荡人心魂的演绎。这首先表现在李慕白与俞秀莲、孟思昭之间的情义纠葛上。那种侠客之间的惺惺相惜、那种互尊互助,于哀婉中激荡着深情。不仅如此,王度庐还写出了内务府旗人德啸峰对李慕白那种极富旗人性情的兄弟情义。为了报答德啸峰患难相助的兄弟情义,李慕白杀死作恶多端的无耻小人黄冀北后,为了让德啸峰摆脱干系,甚至自首入狱,决意以死相酬。兄弟情义的可贵在爱情和生命的极端体验中得到了更大程度上的张扬,小说也因此行侠与颂义两条线索的交织中完成了一段侠客传奇的精彩书写。

### “关帝情结”对侠客情义的规范和对侠义人生的压抑

中国的武侠小说经由汉代的史传文学、唐宋豪侠小说以及元末明初的英雄传奇等文学形式的陶冶,从清代中叶开始逐步具有今天所谓武侠小说的类型特征,但是清代的侠义之作在侠义精神的取向上则开始变得窄化,表现出高度伦理化的特征。用鲁迅的话说,这时的侠义人物是不反对政府的,往往是清官大吏总领一切豪俊。但是就旗籍作家的武侠小说创作来

说,还是有与非旗籍作家的武侠小说不同的特点,那就是在“关帝情结”的作用下,侠义精神被进一步“提纯”。韩云波认为,中国历史上的侠客有私剑之侠、有道义之侠、有江湖之侠、也有流氓之侠,<sup>①</sup>而在旗籍作家的笔下,则大都是道义之侠,而这种道义,表现在兄弟情义上,也是被进一步“提纯”了的道义。

首先是侠客之间的兄弟情义都是以对于君主或以君主为象征的王朝的忠义为基础和基本前提的。在旗籍作家笔下,作家大都有对于皇帝圣明的预设。因此兄弟情义是严格被规范在对皇朝的共同忠诚基础之上的,侠客们所要平的对象则是一些乱臣贼子、贪官污吏或市井恶人,其行侠的基本目标是共同的,侠义行为都是得到政治正确所卵翼和保证的。《儿女英雄传》开篇即赞颂“我朝大清”康、雍盛朝的非同凡响,《三侠五义》也首先说明那是一个君正臣良的世界。即便是到了民国时期,赵焕亭笔下的《奇侠精忠传》仍然要表现“精忠”的主题,小说中即使是有着道家思想追求的于益,归隐了山林,但那也是在成全兄弟情义协助遇春平了教乱之后,也是要等待功成身退,要“一剑功成报吾皇”。到了王度庐那里,虽然时代的进一步发展,称颂皇朝已经不合时宜,作家的“现代”思想意识已经明显增强,但是作家笔下的侠客仍不否认现存的政治秩序,尤其是对于铁小贝勒、邱小侯爷这些旗人贵胄之侠的塑造,作为一种替代性的人物,仍能让人感受到小说侠义人物的忠义意识。

其次,旗籍作家笔下的兄弟情义极力规避了江湖之侠的所谓行帮道德、会党道德、门派道德,江湖义气被正统的伦理道德所规训、所修正。《三国演义》中,刘、关、张结义的誓词中既有“上报国家,下安黎庶”这种超越了江湖义气的政治追求,也有“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的江湖义气成分。而在清代的关帝崇拜中,前者无疑是得到突出强调的,君主已经不再是结义兄弟中的一员,因此兄弟情义就更多地落在臣属身上,是对君王的共同地单向度地倾心辅佐,是这种忠义之下的“下安黎庶”。《三侠五义》中的五义即便是聚于陷空岛,也并非是自立山头、打家劫舍、反抗官府的草泽豪杰,而是侠义人物,而且各自还有行侠的独立性,并没有行帮色彩。《儿女英雄传》中,即便邓九公在考武举时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其并不反对官府,而是退而求其次,干起了保镖的行当。其与十三妹的交往,以及十三妹与海马周三等人的交往,虽然似乎存在着江湖义气的成分,但是这种江湖义气更多的是被邓九公、十三妹以正统道德所引导并加以主导的,甚至邓九公最后与十三妹一道,还将海马周三等一班绿林人物改造成了“买犊还刀”的本分良民。王度庐笔下的侠义人物也都是保证了行侠仗义的纯粹性,真正的侠义之士是不拉帮结派的,因此无论是李慕白与德啸峰等人的交往,还

<sup>①</sup> 参见韩云波《中国侠文化:积淀与传承》之第二章“中国侠文化的历史形态”,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年。

是其与孟思昭、俞秀莲的情义，都体现出一种超越了帮派意识的对于纯粹的侠义境界的追求。

但是，古代世界并非像作者所预设的那样是一个清明之世——即便有乱臣贼子，但主流仍然是君正臣良。在清代所谓侠义公案小说大行之时，也正是清代内忧外患扰攘之时，正是乱世。所谓“乱世出游侠”，行侠仗义作为通俗文学的表现内容，其正是曲折地映现了民众对于秩序和安定生活的渴望，而旗籍作家笔下的武侠小说无疑更带有旗人社会这一特殊权利阶层对于保有清朝江山的特殊渴望或者说对于康雍乾盛世的情感迷恋。因此在“关帝情结”的作用下，作家们在对兄弟情义的书写中既弘扬忠义又规范私义的同时，即便是作为文学想象，也明显具有对于侠客们的侠义人生的围限和压抑。其表现可见诸以下方面：

第一，关帝情结中的刘关张这三个结义兄弟的崛起，首先恰恰是其对于黄巾军起义的镇压，是出于对历史正统秩序的极力维护，因此表现于旗籍作家笔下的兄弟情义总是带有这种隐含的政治历史意识，即便是民国时期的赵焕亭和王度庐的作品也是如此。这与民国时期，诸多非旗籍武侠小说作家中通过“反清复明”的历史意涵的设定，来构建冲突，表现侠客人生形成鲜明对比。因此表现在创作中，旗籍作家总是执着于“现实”世俗生活场景，而江湖世界更多的是市井，而非是一个隐然与朝堂对应、对立的亚社会人群所构成的世界。因此，在旗籍作家的笔下，我们看不到司马迁笔下游侠那种“不轨于正义”的一面，而正是这“不轨于正义”的一面，尤能看出侠义人生、侠义人格的社会批判向度。也看不到唐传奇中那种天马行空般的豪宕飘忽的侠士形象，那里面实际上是蕴涵着某种对更为深刻的自由精神的向往。

第二，从具体的兄弟情义来看，包含着侠义内容的英雄传奇《水浒传》更可以作为一个有意味的对照。这里至少出现了两个方面的不同：一是对于“忠义”的不同解释。梁山好汉后来也讲忠义，但是这个正统意识更是出于对于传统的“天道”的认知，是对于皇帝昏庸、奸臣当道、贪官污吏横行的强烈不满和反抗意识。梁山好汉的兄弟情义虽然有行帮意识，但这个行帮意识里面也暗含着结义的兄弟对于君王不再是无条件的服从。而由于在旗籍作家的笔下已经把皇帝或者至少是皇权下的政治伦理秩序先在地神圣化或者合理化了，因此服从就成为必然。另一个是兄弟本身的情义的不同演绎。全本《水浒传》中的好汉们虽然都接受招安这一历史情境中的不得不然的选择，但是结局仍然是悲剧性的，这尤其表现在李逵与宋江这对兄弟身上。那种同死而无憾的兄弟情义因其含蕴深广，而别具撼人心魄的力量。侠义人物的死去固然可以说是现实人生的失败，而从另一个意义向度上来说，则是与兄弟情义紧密相关的侠义人生意义的高扬，因其透露了历史处境的残酷、险恶，激荡着兄弟情义对于侠义之士所存身的历史处境的反思和批判。而在旗籍作家的笔下，侠客们的行侠仗义基本上都是“性



之所好”,被视为一种“游戏”,特别是即便行侠的矛头指向豪门势要,仍能够得到清官、在朝的旗人高官的保护甚至荐举,其行侠的结局是有全身而退的保证的,因此小说也就失去了对于文学所应具有的对于更为高远的意义世界的追寻。兄弟情义在焕发着日常人性魅力的同时,也就缺少了对于情感的更为深刻层次的政治历史意蕴的挖掘。而这一点即便是在清朝已经被推翻的民国时期,也是如此。

赵焕亭笔下的冷田禄固然也可以说是一个悲剧人物,但是,这个悲剧,更是个人性的悲剧,作者主要强调其家庭出身之影响,更强调其邪僻之性。所以即便杨遇春如何规劝,其性天成,虽然有摇摆而亦邪亦正,终不能归之于正,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冷田禄“堕落”的更为宽广的社会政治历史意涵。“精英文化如儒家文化讲究人之习染,所谓性相近,习相远,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是指人与环境之间的一种互动关系,从心理学或人之社会化的人格理论角度考察,儒家学说有它的胜义。但是儒家的心性学说同时是儒家政治文化的基础,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修齐治平均系于心性的修持,这就离开了社会的物质存在而一味‘唯心’去了”<sup>①</sup>。作家对于杨遇春与冷田禄的兄弟情义的表达也因为这种理学内涵而使其侠义人生缺乏了飞扬灵动的色彩。王度庐笔下的李慕白虽然极重兄弟情义,但是这种对于兄弟情义的注重,因为对于其时现存社会秩序的过分遵守、对于侠义之道的极力维护,虽然从一个方面说其实现了侠义人格的自我完成,但是从小说对于悲情的叙事来说,李慕白既是克己的,同时则又是极为为己的,而忽略了其情感的另一维,那就是对于俞秀莲的人生的忽视。固然,可以说王度庐有意通过特殊历史情境的营造来制造这样一种紧张以渲染悲情,从而不乏激发读者对于侠客情义所包蕴的价值内涵进行质疑的意味,但是,从二人的情感结局来看,这一悲情却不免有矫情的意味。实在的,在经历这样一番情感经历后,李慕白的侠义人生已经没有什么“辉煌的业绩”可言了。孟思昭本有着几许古游侠桀骜不驯的精神,但作者显然表达了其对现存社会秩序的无可反抗性的认知,对于兄弟情义的注重,使他放弃了自己,而且其本意在“成全”,但是却造成了更不幸的结局。这里面的侠义人生是压抑的,更是被“关帝情结”所笼罩下的兄弟情义所牢笼的。

(张书杰,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

【责任编辑:刘大先】

<sup>①</sup> 范伯群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第 474 页。